

明清 云南妇女生活 研究

沈海梅 / 著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文丛

云南教育出版社

明清

云南

妇女生活 研究

沈海梅 / 著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文丛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云南妇女生活研究/沈海梅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10

I. 明... II. 沈... III. 少数民族—妇女—生活方式—研究—云南省—古代 IV. D44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4385 号

责任编辑: 黄 凡

封面设计: 向 炜

责任技编: 荣 璟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文丛

明清云南妇女生活研究

沈海梅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含彩插) 字数: 230 000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415-1917-0/D·23

定价: 16.00 元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文丛》 总 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从 1981 年开始实施到现在，整整 20 年了。云南大学的中国民族史专业是中国第一批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的专业点之一，也是当时云南省惟一的博士学位授权点。

云南大学的中国民族史专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第一批博士学位授权点，应该归功于“南中泰斗，滇史巨擘”方国瑜教授。创建一个博士学位培养点和授权点，关键在于有一位杰出的学术领导人。学术领导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导师，而是导师们的导师。方国瑜教授在中国民族史、民族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云南地方史等领域，是得到国际公认的学术权威。作为学术领导人，具有学术权威诚然是先决条件，但这还不够，还必须有正直的道德品行、独立的人格操守、高尚的学术品德，不追名逐利、不畏权惧势、不趋炎附势、不媚俗随时。做学问就是做人，做人过不了关，所做学问通常也难以经得起检验。方国瑜教授时常说：“所有知识都是属于社会的，来自社会，归于社会，非个人所得而私有，乃通过个人劳动，在已有基础上增益新知。”他信守的格言是：“不淹没前人，更胜过前人。”对于方国瑜教授，尊

重前人成果，严守学术规范，已不是外在的要求，而是自觉的行动。他一生孜孜不倦地在学术园地耕耘，不论乌云压城还是浊浪翻滚，不论党同伐异还是流言蜚语，他始终坚定不移、披荆斩棘、义无反顾、奋力前行，终于成为一代宗师、一代昆仑。方国瑜教授在学术上的献身精神以及对本专业发自内心的挚爱，成为学子的楷模和表率；神圣的敬业精神和严正的学者风范铸造了他自身人格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不少学子慕名投身他的门下。自他执教于云南大学以来，他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培养了几代学者，桃李满天下。他的弟子中不少人已成为著名的学者和优秀的学术领导人。

方国瑜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创办中国民族史教研室时，江应樑教授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诸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江应樑教授原来是从从事社会学与民族研究与教学的，他擅长田野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德宏、凉山、西双版纳等民族地区做田野研究，写成《摆夷的经济生活》、《摆夷的文化生活》、《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等人类学（民族学）的传世之作。江应樑教授加盟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设，将人类学、社会学田野工作的理论与方法，和他自己从事田野研究的丰富经验带到民族史研究中，提出“人类学与民族研究的结合”的命题，为云南大学的民族史研究与人才培养做出了新的贡献。五六十年代，他和方国瑜教授一起，培养了三届七位副博士（硕士）研究生。60年代，他与方国瑜教授一起编写《中国民族史讲义》三大册。80年代末，他主持完成《中国民族史》的编写工作。这套书一出版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好评，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方国瑜逝世后，江

应樑教授成为中国民族史重点学科的领导人。他培养了十数名硕士、博士研究生。他的研究生现已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出色的成绩，成为新一代的专家、学者。

尤中教授 1954 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他从方国瑜的学生成为方国瑜的助手，进而成为蜚声中外的教授。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尤中教授在云南民族史、西南民族史、中国民族史的田野里勤勤恳恳地耕耘，不仅著作等身，还培养了数十位硕士、博士研究生。他以骄人的成就，成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大学开创中国民族史专业，筚路蓝缕，备尝艰辛。在众人追赶热浪的时候他去自守“冷门”。尽管当时被人讥讽为“政治觉悟不高”、“白专典型”，他也置之不理，依然孜孜不倦地认真做学问，真正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晚年，他在《滇史论丛·自序——略述治学经历》中回首往事时，不无自豪地说：“1954 年，周恩来总理至昆明，视察云南大学，指示历史系教学、科研应重视地方特点，出人材、出成果。乃于年秋开设《云南民族史》科目，由瑜主讲，编印讲义成两厚册，虽为由无到有之创举，学术水平则甚低下。次年，设云南民族史专门组课程，相继成立研究室、研究所，与诸同道勉力从事，课题渐多，亦渐充实，昔日冷门寂靜之学科，二十五年来已渐有繁荣景象矣。”

方国瑜先生的《略述治学经历》是在 1980 年写成的。20 年过去了，薪尽火传，一代新人继承方国瑜先生的遗志，在中国民族史与云南地方史的研究中坚持不懈地努力，取得了新的成果。从方国瑜培养中国第一个民族史博士研究生开始到现在，云南大学已培养中国民族史博士研究生三十余位。

这些研究生以方国瑜先生为榜样，潜心学术、淡泊名利，对所学专业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豪感，并将这种感情转化为刻苦学习、奋发向上、一往无前的强大动力。

方国瑜、江应樑、尤中等老一辈学者为云南省以至整个中国的民族史学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在云南学术史上树立了光辉的里程碑。新一代的博士们，有比前人更好的社会条件、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理应做出更大的成绩。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民族史学不是一门可以很快普及的学问，要入门不容易，登堂入室就更难，需要长时间的坚忍不拔的努力，需要百折不挠的精神，需要坚持不懈的奋斗，需要清醒冷静的钻研。我毫不怀疑，新一代的博士们定能在前人的基础上，继承优秀的学术传统，在新世纪创造出无愧前人、无愧时代的新成果。

现在，我们从已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论文中，选编一部分博士论文出版。这些论文，经过同行专家严格、认真的评审，并通过资深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的答辩，现在，作者又作了修订。不是说，这些论文都已尽善尽美，但毫无疑问，这些论文都是同行专家们一致肯定的创新性成果，都遵循了方国瑜先生“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的教诲。

这些博士论文出版时，方国瑜先生和江应樑先生已不及见了。这些博士论文的出版，标志着方国瑜先生期盼的民族史研究的繁荣景象的确已经到来。方国瑜先生和江应樑先生九泉有知，当感无限欣慰。他们也会鼓励我们：学无止境，应当戒骄戒躁，兢兢业业，不断进取。

林超民 谨识

2001年6月于云南大学补拙斋

《明清云南妇女生活研究》序

林超民

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云南地方史从传统的“志书”独立出来，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并取得长足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可是在丰硕的地方史成果中，我们很难找到专门研究妇女生活历史的学术论著。90 年代中期，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图文并茂，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云南各民族的女性文化。这套书偏重于文化人类学的阐释和当代妇女一般生活的描述。这套书的出版时逢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反响颇大，可见妇女问题研究的紧迫性和妇女研究的缺乏。在妇女解放的呼号不断回响的 20 世纪，在云南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的同时，妇女地位也随之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妇女历史研究的滞后，不能不令人有所遗憾。

在我们刚刚迈入 21 世纪时，一部专门研究云南妇女生活史的学术著作问世了！这就是沈海梅博士的《明清云南妇女生活研究》。海梅君的这部新作，既是一项筚路蓝缕带有开创性的工作，同时也填补了目前许多人还没有注意到的一块学术空白。这对云南省以至中国的妇女问题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

海梅君以《明清云南妇女生活研究》一书通过博士论文

答辩，荣获博士学位。以著名历史学家李埏、方龄贵、木芹、朱惠荣、王树五、朱端强等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对这篇论文的评价是：

《明清云南妇女生活研究》第一次对云南妇女生活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这是一个基础薄弱、问题复杂、理论难点多的课题。作者以极大的勇气，知难而上，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广征博引，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综合分析，勾勒出远古至元代云南各民族妇女生活的状况，着力论述了明清云南各族妇女的物质生活、婚姻家庭和年节娱乐等，指出云南各民族妇女生活的差异性，并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对《新纂云南通志·列女传》记录的近一万一千名列女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并分类统计、制作成若干表格，清晰地展示各类妇女的生活状况，探析她们的心声；从她们婚恋观、生死观的巨大变化，揭示明清时期云南社会经济文化的重大变迁，在云南妇女史研究中取得创造性的成果。同时，作者从新的角度审视云南社会变迁，多有新意，使论文更具学术价值。

当我们读完这部著作时，会由衷地赞同答辩委员会恰如其分的公允评论：这确实是云南妇女史研究的创造性成果！

由于人类经历过“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时代，女性因此享有过一段辉煌，就连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都曾以女性面孔出现（《大戴礼》）。当私有制形成后，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女性的继承权被废除，而确立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继承权。“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

界历史意义的失败。”^①随着家长制的出现，我们便进入成文历史的领域。家长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财富一起，开辟了一个延续到20世纪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男子权力发展的同时是妇女地位的不断下降。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易经》中阴爻的代表意象就有“女人”；而男人则是阳爻的代表。这就从哲学高度为女人作了定位。女人被安排到从属的地位和赋予卑弱的性格。由于男子执掌了家庭与社会的大权，历史也就以男人为中心书写，妇女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史书之外。在20世纪前，几乎没有学者研究过中国妇女生活史。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陈顾远的《中国婚姻史》等学术著作出版。可是，陈东原先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则没有论及云南妇女生活的状况。

海梅的著作着力研究明清两代云南的妇女生活，但她广征博引、缕析条辨、爬梳排比，对远古至元代云南妇女生活的历史作了简要的概述，为我们认识明清云南妇女生活提供了参照的背景。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时间跨度大，资料散见于各种史籍，难于搜集。海梅以勤奋劳动，为我们了解远古至元代云南的妇女生活勾画了一幅简单明了的图卷。从这幅看似简单实则内容丰富多彩的画卷中，我们看到云南古代妇女在经济生活中不完全依赖男性，她们的社会地位也不见得低下。海梅强调唐代云南妇女“处子霜妇出入无禁”，婚姻较为自由，并对这种民情风俗作出合理的诠释。这是南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云南妇女生活的一个特点。同时，也与大唐的社会生活不无联系。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时代，婚姻思想开放，贞节观念淡薄。唐公主改嫁者达数十人，高阳、襄阳、太平、安乐、永嘉诸公主还养男宠。唐代妇女有较多的社会活动与社会交往的自由。学者们认为，这与大唐国力强盛所引发的自信心与李唐皇室身上具有的推崇妇女的鲜卑遗风不无关系。唐代的南诏政权始终认为自己是“本唐风化”，不仅政治上臣属大唐，而且文化上也认同于大唐。指出这一点，对于认识唐代云南妇女生活是必要的。

海梅在论述明清云南妇女生活状况时对列女问题作了深入精彩的论述。她对《新纂云南通志·列女传》中万余名列女的构成做了计量分析，从中得出结论：明清时期云南妇女生活中最显著的文化变迁是对儒家婚姻观念、婚姻制度的精神与文化认同。通过计量分析发现，为了“抚育后代”而守节的列女所占比例最高，说明大多数列女的价值取向与其说是为了死去的夫君，不如说为了年幼孩童的生存与成长，为了“血脉”的延续。当然，这也是封建礼教规范的重要出发点。明清云南妇女在“诸蛮扬贞风”的文化变迁中，痛苦地完成了对封建礼教的皈依。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的发展时常以妇女的牺牲作为代价。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完成对云南的政治统一的同时，加强思想文化的统一。宋代理学盛行中原之时，僻处一隅的云南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可是到了明清时期，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信条，随着政治的统一而在云南逐渐普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被厘定为“天理”而得到誓死信奉，举国上下自觉或不自觉地严格遵循。海梅

在书中所列的统计表中，列女从唐代的1人发展到清代的9645人。列女在明清两代的迅速增长，为我们展示了一条鲜明的文化轨迹：妇女是封建文化传播、普及、推广的主要牺牲品。当然，这也不是云南独有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唐王朝全国的节妇为51人，宋代增至267人，明代则高达36000人，清初80年间全国的烈女节妇就有12000人之多。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云南虽地处边疆，但它的历史进程与中原有着密切关系。在历史上，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无不受到中央王朝或多或少的影 响。云南自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云南设置益州郡以来，就在中央王朝的一体统治下不断发展。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整体，当“存天理、灭人欲”的贞节之风在“蛮夷”地区飞扬回荡之时，我们看到的是封建礼教从中原到边疆、从上到下的一体化。

近几年，云南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新闻媒体对云南的“小脚老奶”突然大感兴趣。这些老奶的小脚之所以引起新一代学人的关注，无疑是因为“小脚”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 中，妇女从属与卑微的地位越来越发展，缠足则把女性的从属与卑弱推向极端。如果说，表彰“贞女”、“节妇”是用“存天理、灭人欲”摧残妇女的心灵，那么缠足则是对妇女身体的摧残。至今健在的“小脚老奶”大多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缠足的。早在民国元年，孙中山大总统就命令内务部发布《劝禁缠足》的文告。1928年北伐胜利之后，南京政府颁布禁止妇女缠足的条例16条。说明在中原早已禁止缠足后，云南不少地区缠足之风尚未完全改变。“云南高原的小脚女人”正是明清妇女生活史留下的“活化石”。历史学家在考察这些活化石时，

其角度与其他学科的学者有所不同，他们较为冷静与客观，他们不追求一时的“轰动效应”，而执著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

缠足的小脚女人毕竟只限于儒家文化浸润的城镇及附近地区。在不少民族地区，妇女上山砍柴，下田栽秧，要承担大部分农活，所以妇女们大多还是天足赤脚。少数民族的男子汉们并不像汉族的男性那样喜欢女人亭亭玉立、婀娜多姿，风姿绰约、轻盈柔和，他们的女人要劳动，所以立足要大、要平。正因为少数民族妇女参与主要劳动，所以经济和社会地位并不低下。这也是我们在看到一体化的同时不应忽视的“多元文化”。海梅已注意到这种差异，所以她论述了云南不同民族妇女生活的差异性，将这种差异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并论证了产生这些差异的诸多原因。

海梅1985年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学习，勤奋、刻苦、好学与智慧使她毕业时在班里名列前茅，并顺利考取硕士研究生。取得硕士学位后，她在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教学与研究工作使她更感学识不足，富于进取精神的她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以充实自己。在部分青年人中急功近利思想滋生、厌读情绪弥漫、投机取巧公行的时候，海梅肯苦读于寒窗之下、潜心学术研究，不为窗外精彩纷呈的世界动心，实在是难能可贵。近五六年来，海梅以坚持不懈的努力，百折不挠的毅力，孜孜不倦的勤学，在资料零散、经验不足、时间紧迫的艰难境遇中，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论文通过答辩后，虚怀若谷的她又多方求教，对论文做了补充修改，终于完成了这部资料翔实、观点正确、多有创建的著作。广大读者会对全书作出公允的评价。忝为海梅导师的我

似乎不宜在此捧场喝彩。我想要说的是，云南妇女历史的研究刚刚起步，资料的收集、整理尚处于初级阶段，理论探讨与基础研究尚感薄弱，不少领域等待开拓，诸多空白尚需填补，希望继续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妇女史研究、为云南史研究做出新的成绩。我想，这样一部观点新颖、见解独到、资料丰富的著作或许会引起更多的读者与学者对研究云南妇女问题的兴趣。我希望更多的学者关注云南妇女史的研究，涌现更多、更好的妇女史论著。

人类文明史的开端，是以妇女权利的失落为标志的。步出原始社会的女性就开始了漫长的崎岖坎坷的苦难历程。人类摆脱野蛮进入文明是以牺牲妇女为代价的。妇女的解放，也就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研究妇女史，令人感到辛酸和痛苦。而我们研究充满血泪的妇女史，正是为了结束妇女悲惨的历史，让男人和女人一起，共建人世愉悦、和谐与幸福的乐园。我想这正是海梅苦苦追求的目标，也是海梅这部著作在今天出版的意义和价值。

2001年6月16日于补拙斋

前言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阴阳合和相生万物，世间创造了男女，男女繁衍了人类。在人类创造的文明中，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都深深地打上了女人的活动印记。我们说，女人在参与创造人类历史的同时，也在创造着一部女人自身发展的历史，只不过这部历史在人类刚刚迈向文明门槛的时候就被男性的历史所掩盖。在英语词汇中，History 一词已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他史”，一部男人的历史^①。于是在各种文明中，我们所能见到的国家是男性主宰的国家，政治是男性主导的政治，法律是男性按照自己的意志制定出的一整套能约束人们社会行为的条文，经济是在男性的组织下进行的生产和分配。不仅如此，男性在人类活动中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成就成为人类文明的标志，宗教是上帝在天堂中代表男性发出的声音，道德是以男性行为为规范的说教，似乎只有男性才是人类情感的表现者，他的审美意识左右着人类艺术作品的情趣，他的价值取向成为人类精神发展的潮流。人口学家告诉我们，男女人口的出生比例是基本相等的，就算加上局部

① 禹燕：《女性人类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地区局部时期有杀害女婴等现象的存在，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女性始终基本占据世界人口总数的一半。如此众多的女性群体，我们在人类文明史中却见不到她们的身影，并且在男性历史中，女性被视为人类文明的破坏者，她们是潘多拉，她们是祸水，她们是“小人”的同类，是“难养者”。陈东原先生也曾发出感叹：“三千年的妇女生活，早被宗法的组织排挤到社会以外了。妇女才是零畸者！妇女才是被忘却的人！除非有时要利用她们，有时要玩弄她们外，三千年来，妇女简直没有什么重要。”^① 只要是一个不带性别歧视的人、一个具有人性的人、一个能客观看待历史的人，就会认识到：这是一部不公正的历史！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一门新兴学科——女性学，应运而生。女性学把女性本身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对女性本体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并从女性角度来重新阐释政治学、经济学等各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以女性意识为主导重新阐释人类历史，以弥补传统历史学由于对女性的遗忘而造成的缺陷，这也是女性学的重要任务。正如美国学者麦克米伦所说：“一旦我们把妇女问题的内容补充进去时，我们对过去的看法就会合理地改变，我们对历史问题的理解也会加深。”^② 我们相信，以女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历史，并

①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自序》第 2 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90。

② 臧健：《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回顾》，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 年第 2 期。

不是要用 Herstory——女性史来代替 History，而是要恢复人类历史的真实面目。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文明史中，从母系时代的母权家长沦为皇权、族权、父权、夫权的牺牲品，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半边天”，中国妇女走过了一条极为艰难、坎坷的道路，她们的命运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使妇女史研究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 20 世纪前期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陈顾远的《中国古代婚姻史》，到 80 年代中后期，李小江教授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所陆续出版的《夏娃的探索》、《女性观念的衍变》、《女性审美意识探微》、《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发现妇女的历史》等一系列妇女研究专著，都是 20 世纪中国妇女史研究取得的成果。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许多理论和方法不断介绍到中国。90 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李小江等人主编的《性别与中国》。该书汇集了 1992 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召开的“性别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多篇论文，这些论文多为美国的中国妇女问题研究者所作，论及中国妇女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以及妇女与文化，生育、人口与性等方面的问题。这样“以性别研究作为一个角度、一种方法去分析和解构一个民族、一种传统、一段历史，是妇女研究正在走向成熟的标志”^①。鲍晓兰主编的《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则汇集了在美国各大学学习的中国学者对西方

^① 李小江：《性别与中国·序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